



张光芒 魏建 编选

# 朱德发

## 学术精选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资助

# 朱德发

## 学术精选集

张光芒 魏建 编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德发学术精选集/张光芒, 魏建编选.——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209-12003-6

I. ①朱… II. ①张… ②魏…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7170号

## 朱德发学术精选集

ZHUDEFA XUESHU JINGXUANJI

张光芒 魏 建 编选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胡长青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65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34.5

字 数 560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12003-6

定 价 8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目 录

|                             |     |
|-----------------------------|-----|
| 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创作 .....        | 1   |
|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     | 16  |
| 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商兑 .....          | 45  |
| 论茅盾前期的新小说观 .....            | 77  |
|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    | 99  |
| 宏观审视:黎明期新文学的“现代型”特征         |     |
| ——《中国五四文学史》绪论 .....         | 115 |
| 鸳鸯蝴蝶派小说观新探 .....            | 131 |
| 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         | 141 |
| 论茅盾小说“时代女性”的性格结构特征 .....    | 150 |
| 现代纪游“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学体裁”           |     |
| ——《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导论”第一部分 ..... | 159 |
| 一份《文学史观讨论》的答卷 .....         | 171 |
| 20 世纪中国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美学倾向 .....  | 181 |
| 评判与建构                       |     |
| ——新文学史研究主体思维的沉思 .....       | 192 |
| 一个“女性绕着男性转”的原型模式            |     |
| ——从《雷雨》婚恋关系谈起 .....         | 214 |
| 城市意识觉醒与城市文学新生               |     |
| ——五四文学研究另一视角 .....          | 234 |
| 开放与创造:文学史研究的发散型思维 .....     | 245 |
| 新文学流派研究的社会学方法 .....         | 257 |
| 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 .....          | 268 |
| 中国新文学流派特性论 .....            | 285 |



|                                |     |
|--------------------------------|-----|
| 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 .....         | 296 |
| 文学现代化首在创作主体意识现代化               |     |
| ——重读鲁迅其人其文之一 .....             | 309 |
| 论 40 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      | 326 |
|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的多元性 .....        | 349 |
| 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英雄理念”的嬗变与钩沉 .....  | 365 |
| 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 .....         | 378 |
| 探询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与旧认知模式 .....         | 392 |
|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30 年 .....            | 402 |
| 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特征 .....          | 413 |
|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        | 427 |
|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关键在于探索其联系性与互通性 ..... | 442 |
| “里比多”释放的悲歌和欢歌                  |     |
| ——细读莫言《丰乳肥臀》有所思 .....          | 452 |
| 鲁迅个性意识的当代思考 .....              | 465 |
| 质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
| ——以文学史举证 .....                 | 477 |
|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式的重建 .....          | 488 |
| 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儒帅风范          |     |
| ——纪念新文学运动百周年有所思 .....          | 503 |
| 重探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人类性审美特征 .....      | 520 |
| 后记:重读先生,初心永恒 .....             | 541 |

## 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创作

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去国集》除外)写于1916年到1921年这个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封建军阀背靠帝国主义演出一幕幕复辟倒退的丑剧,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五四运动逐步拉开帷幕,以提倡“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与此相适应的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学运动正在展开。这是一个新与旧、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交替的伟大时代。在这伟大时代面前,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总是要登台表演一番,亮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胡适倡导白话诗、“尝试”白话诗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呢,还是适应潮流发展并加以推波助澜呢?他于1916年4月写的《沁园春·誓诗》已作了明确回答: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sup>①</sup>

当时中国诗坛上,弥漫着一股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规摹古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sup>②</sup>,处处是陈言滥语,表现一种“伤春悲秋”的消极颓废的情调,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面对诗坛上这股腐臭的诗风,胡适发出“制

① 胡适:《藏晖室札记》(第12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892页。

② 胡适:《寄陈独秀》,《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3页。



天而用之”的呼唤,决不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立誓“为大中华,造新文学”而“搦旗作健儿”,表现他献身新文学运动的气魄和勇气,以顺应时代的要求。

正因他立下“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雄心,所以敢于向当时成了诗歌创作沉重桎梏的文言旧体诗挑战,极力倡导“白话诗”,并反复陈述以白话作诗的理由:第一,从进化的观点出发,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而“白话之文学”乃是“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因此“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我们要“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sup>①</sup>,以白话作诗尤为紧要。第二,他从文与质的相互关系中,揭露了当时“旧文学之弊”在于“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它的“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因此“欲救旧文学之弊”,“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sup>②</sup>,即用白话作诗,这是“涤除‘文胜’之弊”的条件之一。第三,他从“古今中外”文学革命运动中,概括指出文学革命“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sup>③</sup>;而“诗体的大解放”,就是“要做真正的白话诗”。他之所以从“文的形式”入手,欲用白话作诗,主要是从“新内容和新精神”的要求出发,强调形式更好地为内容服务,因为他认识到“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sup>④</sup>。第四,他认为“文字者,文学之利器也”,而“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唯有白话才能充当新文学的工具;“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但是“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则需要“实地试验”,因此他决心“以数年之力”练习白话作诗,“新辟一文学殖民地”<sup>⑤</sup>。

胡适不仅认识到倡导白话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提出了具体“实验”白话诗的主张:其一,指出诗界革命的具体途径,即从诗体的解放入手,因为有了“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sup>⑥</sup>。其二,指出新诗要表现“簇新世界”,不仅具体说明新诗要广泛地

①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45—47页。

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62页。

③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27页。

④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28页。

⑤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74页。

⑥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28页。



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而且明确点出新诗的表现对象应该包括工人农民在内<sup>①</sup>。其三,指出新诗不能“无病呻吟”,发誓“无病而呻,壮夫所耻,何必与天为笑啼?生斯世,要鞭笞天地,供我驱驰”<sup>②</sup>,批判当时那种“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唯恐其早谢”<sup>③</sup>的哀伤诗风,提倡“乐观主义”入诗,这是“旧诗中极罕见”的<sup>④</sup>。其四,指出“真正的白话诗”,要讲究诗的自然音节,要“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应该“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节”要“依着意义的自然区分与文法的自然区分”,注意“顿挫段落”,总之,“新诗大多数的趋势”,“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sup>⑤</sup>。其五,指出新诗的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即“既可以读,又听得懂”,“诵之村姬妇孺而皆懂”,“能达意”,“优美适用”<sup>⑥</sup>。其六,指出新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即“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所谓“具体的做法”就是要采取形象化的手法,“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增强“诗的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因而诗“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sup>⑦</sup>;所谓“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就是反对“抽象议论”,纠正或防止新诗创作的理念化倾向。

胡适这些主张,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因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自清曾回忆说:“《谈新诗》差不多成为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sup>⑧</sup>这种说法也许是言过其实,不过也可以想见胡适的新诗主张在当时诗界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胡适对白话诗的创建不仅提出一套较系统的理论,而且他也是白话诗的拓荒者之一。他认识到,“白话之能不能作诗”,“而在吾辈实地试验”<sup>⑨</sup>。凡事开头难,要打破旧诗体,创造表现“新内容和新精神”的白话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要遇到很大的阻力。这是因为文言旧体诗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一直被视为封建正统文学,它在社会上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文化教育界尤为

①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88页。

② 胡适:《藏晖室札记》(第13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896页。

③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

④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页。

⑤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43页。

⑥ 胡适:《藏晖室札记》(第13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943页。

⑦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49页。

⑧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页。

⑨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72页。





突出,这就形成一种传统力量;另外它背后还有政治势力维护它,给它撑腰。刘半农曾回忆说:“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sup>①</sup>。所以当时要“实地试验”白话诗,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尝试”精神,而且需要毅力和勇气,迎击旧势力的挑战。他对宋朝诗人陆游的“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观点,反其道而用之,提出“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论断,并以此为指导,开始进行白话诗的尝试。但他并不盲目乐观,充分估计到这场诗界革命不是件“容易事”,“小试便成功”是不可能的,因而作了“试到千百回”的思想准备,不仅有“成功”的坚定信念,而且也作了“前功尽抛弃”的打算;即使一旦失败也可记取教训,“告人此路不通行”,并希望“大家都来尝试”<sup>②</sup>。

胡适敢于“辟除”旧诗坛上的“荆棘”,大胆“尝试”。当他1916年7月12日为其学友改一首诗,提出白话入诗时,就触怒了梅觐庄(即梅光迪,后来成了“学衡派”成员)。梅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反对以白话写诗,诬蔑“村农伧夫”的“俗语白话”,“鄙俚乃不可言”,以此作诗是“无永久价值的”<sup>③</sup>。针对梅光迪的攻击,胡适作了一首长达千字的白话游戏诗,不仅对梅光迪的复古守旧行径予以淋漓痛快的嘲讽,而且“有意试作白话诗”,“要求今日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文作歌”,这样的“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sup>④</sup>。由于他在“尝试”白话诗的过程中,不断地排除守旧势力的反对和干扰,积极地“实地试验”,因而逐步扩大了白话诗的影响,过去“反对白话,且竟作白话之诗”<sup>⑤</sup>。1917年初,以《新青年》为阵地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刚刚兴起,封建文学的卫护者林纾就急忙在上海《国民日报》(1917年2月8日)抛出《论古文之不宜废》,反对用白话作文作诗,反对废除僵死的文言;胡适当即写信给陈独秀,对林纾予以驳斥,并“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以为韵文之利器”,同时把自己才尝试“六七月”的白话诗成集,“名之曰《尝试集》”,号召“国中之有志于文学革命者,请大

①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初期白话诗稿》(影印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81页。

③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67页。

④ 胡适:《藏晖室札记》(第14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974页。

⑤ 胡适:《藏晖室札记》(第14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1033页。



家齐来尝试尝试”<sup>①</sup>。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白话诗蔚然成风,胡适的《尝试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920年4月起至1921年1月止,对《尝试集》展开通信讨论,“先后加入讨论的共有十多个人,各人的文章发表在三四种日报和杂志上,转载在五六种日报和杂志上”<sup>②</sup>;“《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sup>③</sup>。这说明胡适的白话诗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他的《尝试集》在新文学运动和广大读者中受到欢迎,并给予“开风气的尝试”的誉赞,但却引起封建复古派的诽谤,“学衡派”的胡先骕攻击“《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sup>④</sup>。这不正是攻击胡适的白话诗,而且诋毁整个新诗运动是“出于常轨”、“趋于极端”,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胡适尝试白话诗冲破了封建文学的“常轨”,显示了新诗运动的威力。

胡适在我国白话新诗的初创期,从理论主张到实地试验,为中国新诗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二

《尝试集》是胡适大胆尝试的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一部新诗集。应当承认,“白话诗是‘古已有之’”<sup>⑤</sup>,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诗人如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这固然在近代诗歌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们从诗歌主张到创作实践,都没有自觉地兴起一场白话诗运动,更没有把用白话作诗放在正宗地位。然而胡适提倡白话诗运动,不仅把白话作诗放在正宗地位,提出“诗体的大解放”,而且大胆地“尝试”,积极从事白话诗创作。1917年新文学运动方兴,他第一个在《新青年》2卷6期发表八首白话诗,接着在《新青年》3卷4期上发表四首白话诗;在他带动和影响下,自1918年开始,《新青年》的白话诗逐渐多起来,形成了白话诗运动。《尝试集》就是我国白

① 胡适:《寄陈独秀》,《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42页。

② 胡适:《〈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序》,《尝试集批评与讨论》,胡怀琛编,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第1页。

③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文存二集》(第4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289页。

④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1922年第1期。

⑤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初期白话诗稿》(影印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话新诗运动最早的成果。对此,不能过分地苛求于前人,必须给予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然而长期以来却对《尝试集》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态度,直到现在有的大学编的现代文学史还这样写道:“《尝试集》是一本内容反动无聊,形式上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个集子五花八门,像垃圾堆一样,名堂甚多,但没有一首真正的诗,更没有一首是新诗。”又说:“这里面有封建士大夫的陈词滥调,有游山玩水、花天酒地的交际应酬,有轻佻无聊的闺情,有失望的悲哀和得意忘形的叫嚷,有对于美国的崇拜和羡慕,还有虚伪的‘革命’说教……‘这个集子里可以嗅到胡适的亲美的买办阶级思想掺合着封建士大夫思想喷发出来的臭味’。”<sup>①</sup>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sup>②</sup>对胡适《尝试集》的评价应取这种科学态度。诚然,从这部集子里“随便挑出”几首诗或从某诗里摘出几句,可以说明它有消极不健康的情调,但这不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说明整个诗集的主导思想倾向。

《尝试集》(主要依据1931年12次的重版本)虽然缺乏《女神》那种强烈的狂飙突进的气魄和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但也不乏新的意境和新的思想气息,对于扫荡旧诗坛上的萎靡腐朽的诗风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诅咒反动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封建军阀政府为维护其腐朽统治,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实行疯狂镇压。《一颗遭劫的星》就是对《北京国民公报》因“响应新思潮最早”而遭到封建军阀查封、主笔被捕被判刑,表示极大的愤慨。它以“乌云”比喻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大星”比喻宣传新思潮的进步力量和进步刊物,含蓄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必将破产;代表“光明”的进步思想和进步力量必定胜利,迎来光明的“世界”。《乐观》是为《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被封建军阀查禁而写的一首诗,它以比喻的手法,揭露反动势力对进步刊物的摧残,颂扬这些刊物所宣传的新思想在群众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说明反动派只能砍倒这棵“大树”,但它所撒下的“种子”定会发芽,长出更多的大树,为“辛苦的工人”造福,并暗示出封建军阀失败的下场。作者不仅对封建军阀进行了鞭挞,而

① 臧克家:《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83页。

② [俄]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且对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礼教也予以嘲讽。《礼》是对维护封建“丧礼”的守旧势力的痛斥及其虚伪嘴脸的揭露,表现一种藐视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

作者对封建军阀政府没有停止在“诅咒”和“揭露”上,且揭示出反动统治势力的压榨,“奴隶们”必然起来“造反”,推倒压在头上的“威权”。为“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和“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而作的《威权》一诗展示了这样的思想内容。由于“威权”(喻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奴隶们”的残酷役使,他们一定要砸断“头颈上的铁索”,“同心同力”起来“造反”,“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把“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双十节的鬼歌》不仅揭露北京军阀政府借纪念辛亥革命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虚伪嘴脸,而且赞扬在辛亥革命中“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炸弹底下来去”的革命英雄,号召“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正因为作者向往重建新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他对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想而献身的烈士谱下一首首颂歌。《黄克强先生哀辞》是为老一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写的赞歌,黄“将军”不仅自己为革命捐躯,而且写“家书”勉励儿子“努力杀贼”,这种前仆后继的精神,“使人慷慨奋发而爱国”;《死者》是为少年英雄姜高琦请愿而遭反动军人刺杀写的颂词,不止对他的死表示“恭敬”的哀悼,并且为后来的革命者总结了教训,指出“请愿而死”是“可耻的”,提倡“以革命而死”,“以力战而死”;《四烈士墓上的没字碑歌》是为“用炸弹炸袁世凯”、“炸良弼”而死的四位英雄好汉谱写的歌词,不仅赞扬“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而且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一弹使奸雄破胆!一弹把帝制推翻!”对那些只能“咬文嚼字”、“痛哭流涕”、“长吁短叹”的“革命者”进行了讥讽。这首歌由肖友梅作曲传唱,当时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作者不止为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写颂歌,而且也为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称二月革命)的胜利写赞词。当胡适在报纸上见到“俄京革命”中“大学生杂众中巷战”的情景,“喜之”作《沁园春》上半阙;后又读报见到“俄政府大赦党犯”,深感“此革命之所以终成功,而新俄之前途所以正未可量也”的原因,在于“爱自由谋革命者”不怕“挫辱惨杀”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遂续成前词以颂之”。这首词虽然两次写成,但基本主题是歌颂俄国二月革命胜利,既赞扬了为推翻沙皇统治、“张自由旗”而“指挥杀贼”的“轩昂年少”的英雄,又赞扬了“与民贼战”的“十万囚徒”,并“拍手高呼,‘新俄万岁!’”特别是“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的富有鼓动性的结尾,进一步表现出作者对这场俄



国革命的向往和期待。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作者写的《人力车夫》,反映了劳动者悲苦凄惨的生活,且给予人道主义的同情;写的《平民学校校歌》竟提出“不做工的不配吃饭”的口号,并劝勉“大家努力做先锋,同做有意识的劳动”。

《尝试集》贯穿着一种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体现在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对“新革命”的渴望、对英雄的歌颂,而且表现在“为国效奔走”的志向上。《文学篇》抒写自己留学几次改变志愿,初到美国时,“所志在耕种”,认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开始注意政治,关心国家大事;面对着“故国方造新,纷争久未定”的现实,立下“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的志愿,表现他为“救国”而学习的爱国主义思想。基于这种爱国思想,作者回国后曾赋诗自勉,激励自己努力“上山”,“头也不回,汗也不揩,拼命的爬上山去”,不仅克服了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而且战胜了自己的“泄劲”思想,最后“猛省”,登上了“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表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在生活道路上,他不相信有什么“诸仙”的恩赐,“异想天开”是极其可笑的,要想有所建树有所收获,必须做到“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沁园春》),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

作者还写了许多表现爱情、婚姻的诗篇。这些诗的思想内容是否像有人所说是“一些靡乱的男女之情”呢?我认为这类诗的大部分的情调是健康的,所表现的虽是资产阶级的爱情观,但在当时反对封建婚姻、争取爱情自由的个性解放运动中,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新婚杂诗》写一对“相思”十三年的男女青年的新婚之夜,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之情,只告诉新婚伴侣要“牢牢记取”这一夜的“中天明月”,意思是要忠于爱情,让爱情像明月一样永放光辉。《老洛伯》是“推为世界情诗之最哀者。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虽系译诗,但也反映了译者的爱情观。这首诗的意义不仅表现了农村劳苦人民吉梅、锦妮、老洛伯的爱情悲剧,说明吉梅和锦妮只有爱情而没有婚姻,老洛伯和锦妮只有婚姻而没有爱情;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指出没有“金钱”的穷苦汉在以金钱为轴心的社会是获不到爱情的。译诗《关不住了!》表现了对爱情的热烈渴求,写得颇有风趣,情感也比较真挚。《如梦令》两首词写自己同爱人的爱情生活,既表现了爱人重情、慎情、深情的娇羞之态,又表现出自己渴求爱情的急切心情,这里并没有秽词淫调,也没有低级下流的动作,主要反映了青年男女相亲相爱的欢悦之情。《应该》批评了“我”的爱情不专一的见异思迁思想,“我”本有所爱又去爱“他”;赞美了“他”的高尚品质,并不迷恋“我”的爱,而



是“总劝我莫再爱他”，并让“我”把爱“他”的心去爱“我”原来的“爱人”。怎能说这样的爱情诗是“靡乱的男女之情”呢？《我们的双生日》写自己和爱人的互相体贴、以“吵嘴”为乐的美满家庭生活，感情比较朴挚，怎能说这是“轻佻无聊的闺情”呢？

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sup>①</sup>既然爱情和婚姻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长远的普遍意义的人生问题，并直接或间接地受阶级利益、阶级关系的支配，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那么，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当然要经常描写爱情、婚姻方面的生活。五四时期反对旧婚姻、要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成了原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胡适这些爱情诗的基本倾向，是符合“五四”时代要求的。

与此相联系的，作者还写了些怀友诗。这些诗是否像有人说的那样都是“封建士大夫的陈词滥调”，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呢？这也需要具体分析。《赠朱经农》抒写朋友久别重逢的“畅谈极欢”的情景，既有对过去“不长进”的自责，又有“你我都少年”的互勉，既有“年来意气更奇横”的豪情，又有“且喜皇帝不姓袁”的兴叹，但也有“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儿上天’”的闲情。总之，这首诗的基本内容是积极的，尽管也流露出一定的消极情调。《朋友篇》既抒写了对朋友帮我“立身重抖擞”的感激之情，也道出了朋友之间的友谊基础是“学理互分割，过失赖弹纠”，并且表示要在朋友的“鞭策”下“为国效奔走”，把交友同爱国结合起来。《许怡荪》抒写对死友的深切悼念，并牢记故友的“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赠言，以策励自己。《我们三个朋友》写朋友之间的友谊并未随着山川风物的变化而疏远，相反越来越深了。《晨星篇》是送别之作，没有那种离恨别愁的哀婉情调，而是鼓励“朋友们”努力去“造光明”，“造几颗小晨星，虽然没有多大的光明，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像这样一些歌颂友情的诗，反映了特定阶级、特定时代的内容，虽然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友爱观，但却流露出一定的时代气息，它给人的不是“反动无聊”或“失望悲哀”之感，而基本上是一种积极的启示、向上的鼓励。这在光明与黑暗交替的五四时代，是不乏进步意义的。

《尝试集》尚有一些写自然景物的诗，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赞美大自

<sup>①</sup>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然的美。这些诗也不能武断地说是“游山玩水”的“无聊”之作，应该细心体会，分清真、善、美和假、恶、丑。《中夜》写中秋之夜的清光美景，它没有明显的阶级色彩，给人一种月明江清之美；《江山》也是写雨中江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却能激起读者对大自然的喜爱；《十二月五夜月》托月抒怀，抒的不是愁思哀绪，而是“心头百念消”的乐观心境；《鸽子》写一群鸽子在晚秋天气里自由自在的翱翔，“翻身映日”，“十分鲜丽”，衬托出作者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艳羡；《老鸦》加托物言志，表现一种不肯向“人家”讨好、不肯向“人家”折腰的刚直不阿的骨气；《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借赞红叶，抒发渴求光明之情；《希望》抒写种兰花草。“希望开花好”的心情，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这些写景抒情小诗，所写之景基本上是美的，所抒之情基本上是健康的，同那时的黑暗如漆、冷酷如铁的腐败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小诗也是反封建的一种表现。此外，还有几首抒写艺术家的甘苦和介绍作诗经验的诗，也能给人一定的启示。

从《尝试集》的“全部总和”来看，它不是“一本内容反动无聊”的东西，而是一部有进步思想内容的新诗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它那种反抗封建军阀的革命精神，“造个好政府”的政治理想，“为国奔走”的爱国感情，歌颂爱情、向往自由、乐观进取的个性解放精神，集中体现了作为“五四”新文化战线重要成员胡适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尝试集》在“诗体的大解放”、诗的白话语言、音韵节奏诸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以适应表现新内容新意境新思想的需要。

“在五四以前，诗在旧时代已经僵化了，新诗从已经僵硬了的旧诗中解放出来，冲破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打碎了旧的枷锁，复活了诗的生命。”<sup>①</sup>胡适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诗体的大解放”，并非一件轻易的事情，他是经过一段艰苦的探索历程，正像他自己所总结的：“我现在（1922年）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女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sup>②</sup>的确是这样，打开《尝试集》便可以看到他在诗体解放的道路上所留下的印迹。他是在我国古典诗词曲的基础上开始了“诗体的大解放”的尝试，有的诗带着明显的古风、乐府或词曲的格调，并不完全是旧体的袭用，而是根据“新内

① 《郭沫若谈诗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2月15日。

②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文存二集》（第4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289页。





容和新精神”的要求进行一定的改造,既保持了古风那种整齐匀称和词曲那种错落有致的形式美,又在某些方面打破了旧诗词的束缚,发挥了自由诗的特长。《尝试集》第一编的诗词,大都是从旧诗词曲脱胎出来的,有的从古乐府演化而来,有的从绝句演化而来,有的从五古演化而来,有的直接用词牌,有的是自由体。这编诗词的旧体痕迹比较明显,“血腥气”比较大。《尝试集》第二、三编的“诗体”同第一编相比,获得了较大的解放,大都能把古体诗词同自由体结合起来,创造出多种形式的新诗体式。如《鸽子》得力于古乐府,但经过改造,成了一首四、五、六、七、十言的自由体,而基本句式却是四、五言,保持了形式整齐的美;《湖上》虽保持“小令”的格调,但它却是一首形式完美的自由体诗;《希望》是自由体,却保持着五古的风味;《威权》《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都是自然灵活的自由体,一洗旧体诗词的痕迹,把旧体的长处糅合于自由体中,成了新的诗体。但必须指出,在“诗体的大解放”中,胡适虽然从外国的诗中找到了借鉴,并把译诗《关不住了》作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然而在新诗的“实地尝试”中,他并没有丢掉古典诗词的传统。

《尝试集》的语言,虽然个别诗篇有点文言的旧痕,但大致上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明白易晓,自然现成,有的接近口语,并能根据不同诗篇的内容选用不同色调的语言:写景诗的语言鲜丽明艳,如《中秋》《江上》《鸽子》等诗;叙事诗的语言真切朴实,富有生活气息,如《老洛伯》等;抒情诗的语言淳挚亲切,感情色彩浓烈,如几首爱情诗;哲理性、政治性强的诗,语言准确有力,尖锐率直,如《上山》《威权》《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等。这一切为我国白话新诗的创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胡适很注意探求白话诗的音韵节奏美,能在旧体诗词音节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改制,创造新音节,以表达新内容。《尝试集》第一编的诗词几乎全用的旧诗音节。第二编则作了大胆的尝试,如《老鸦》中的“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喜欢”一句,用双声叠韵来增强音节的谐婉;《小诗》把原稿改了两个字,一是把“可免”改成“免得”,把“几度”改成“几次”。改的原因是,“免”字读音太响太重,前面不该加一个同样响亮的“可”字,改成“免得”一重一轻,就比较和谐了;“度”改成“次”字,变成齐齿音,这样“几、次、细、思”四个字都成了齐齿音,使人读起来产生一种“咬紧牙齿忍痛”的感情。诗的音节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因此“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





好音节”<sup>①</sup>。这些“尝试”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

《尝试集》不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表现形式,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可以说是“开风气的尝试”,这恐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 三

我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胡适在“五四”前后白话诗运动中的贡献,主要从诗歌理论和白话诗创作两个方面,作了必要的历史肯定;但是我们从来也不否认他的诗歌主张与创作,都存有历史局限性。

白话诗运动总是受着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革命决定并制约的,但是胡适的新诗理论很少强调诗界革命如何同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联系,也没有明确指出白话诗如何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服务,即使提到新诗要“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也比较笼统,没有结合政治斗争和文化思想革命的任务加以具体说明。虽然他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观点,点明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但它掩盖了文学史上的阶级斗争,把“文学的时代性”的意义缩小到诗体演变的范围,说不清为什么同一个时代有两种完全不同文学的对立现象。他提出古今中外的“文学革命”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方面入手”,虽然强调了打破旧诗形式在诗界革命中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方面所在,更不是一条文学革命的内部规律;如果只把从“文的形式”入手当成诗界革命的途径之一,那不失为一个切用的方案,然而胡适却把“诗体的大解放”强调成诗界革命的首要任务,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一般说来,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在新诗运动的倡导初期,旧诗体严重束缚对新思想和新内容的表达,不打破旧诗形式,诗界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的时候,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形式也会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当新诗运动兴起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强调“诗体的大解放”基本上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如果在整个白话诗运动中一直把“诗体的大解放”作为主要任务而忽视诗的内容的革命,这种形式先于内容,形式重于内容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他反复强调用白话作诗,这是符合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革命的要求的,但是“只有用白话作诗”才是诗界革命的“最基本”一条

<sup>①</sup>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291页。